

# 论唐中后期的“二元”制衡机制

王守栋 (德州学院历史系 德州 253023)

**摘要:** 唐中后期, 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, 内有朋党“挟怨憾结, 倾轧排摈”, 外有藩镇“力大势盛, 尾大不掉”, 中央集权岌岌可危。于是宦官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迅速膨胀, 内挟朝臣, 外制藩镇, 形成了唐中后期新的制衡机制, 即宦官枢密使、神策军中尉制约外朝宰相, 宦官监军使制约藩镇节帅的“二元”制衡机制。这种机制维系了唐中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。随着这种机制的瓦解, 唐王朝的统治也随之走到了尽头。

**关键词:** 唐代; 宦官; 宰相; 节度使

中图分类号: K24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3-854X(2008)09-0056-05

唐中期, “三省”制衡的中枢体制开始解体。一方面, 自开元初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, 使唐初奠定的“三省”制衡体制不复存在, 尚书省退出宰相机构, 而中书门下行政职能进一步增强, 决策职能则相对弱化。随着宰相职权的政务化, 导致了中枢机构的不完善, 为宦官参与机要提供了契机。另一方面, 统治集团的构成在唐中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长期把持政权的关陇士族集团逐步瓦解, 山东氏族也相继衰落, 而以科举走上仕途的庶族集团还不成熟, 这也为宦官势力的兴起客观上提供了“生存空间”。

安史之乱, 标志着唐王朝危机全面爆发。藩镇割据、节帅叛乱、朝臣的内争使唐王朝的统治雪上加霜, 在这种情况下, 宦官作为第三种势力内抑南衙宰臣、外监藩镇节帅, 成为维系唐朝统治不可或缺的政治势力。皇帝在南衙、北司、藩镇三种势力之间, 力求达到平衡, 但作为对策的重心, 则主要对朝臣、藩帅权力的制约和权力分割。在中枢, 主要倚重宦官枢密使, 把决策中心由外朝移向内廷; 在地方, 通过监军使加强对方镇的控制; 军事上, 宦官典领神策军内控京师, 外慑藩镇。由此形成宦官枢密使、神策军中尉与外朝宰相, 监军使与藩帅的“二元”制衡机制, 君权只有在几种力量的制衡中才能稳固。因此, 制衡性的“二元”体制被君主视为王朝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。作为这一机制的重要一环——宦官势力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, 是这一制衡链条中的关键环节。

## 一、宦官枢密使、神策军中尉对相权的分割

宦官枢密使、神策军中尉对外朝宰相的制约, 是整个“二元”制衡机制的首要环节, 这主要表现为宦官枢密使、神策军中尉对宰相权力的分割。

宦官枢密使设两员, 掌进奏文表, 充当君主的喉舌; 神策军中尉分左右两员, 统领中央禁军主力——神策军。两枢密使和两中尉是唐中后期宦官担任的最重要的官职, 被称为权阉四贵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250咸通二年二月条: “中尉、枢密权重禁闼。”胡注云: “时以两中尉、两枢密为四贵。”宦官“四贵”的出现, 与唐中后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。唐初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, 如三省制度将秦汉时的宰相机构一分为三, 使之相互制约, “慎守而循一”; 府兵制, 使“兵散于府, 将归于朝”, 形成“内重外轻, 拱卫京师”的局面。君主驾御“如身之使臂, 臂之使指, 莫不从制。”唐中后期, 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, 这种权力制衡机制逐渐瓦解。安史之乱, 标志着唐朝危机的全面爆发, 朝臣的不忠及悍将的叛乱, 加深了皇帝对勋臣、宿将的猜忌, 于是宦官作为皇帝信赖的家奴, 被推上政治舞台。权阉四贵的出现, 正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。

### 1. 宦官枢密使及其职掌

唐代宗始设宦官内枢密一职。《资治通鉴》卷 272 同光元年四月条胡注：“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，有枢密房以主曹务，则枢密之要，宰相主之，未始他付，其后宠任宦人，始以枢密归之内侍。”这里，为我们勾勒出枢密使肇始的过程。即皇帝为分宰相之权，以宦官掌枢密，接受表奏、传达帝命、参决机要，内枢密使应运而生。代宗始设宦官枢密，《册府元龟·内臣部·总序》中记载：“永泰二年（766），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 234 大历元年十二月条：“宦官董秀掌枢密。”胡注云：“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。”《通鉴》的大历元年（766）即两《唐书》等史籍的永泰二年（766），这是由于诸书编纂体例上的不同所致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载：“改永泰二年为大历元年。”由此可见，正式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一职出现于永泰二年。代宗永泰二年，宦官董秀是被任命的第一任枢密使。后来董秀因罪被杀，宦官掌枢密之权一度被取消。至宪宗时，正式确立内枢密使制度。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十二》：“元和中，刘光琦、梁守谦为枢密使。”《册府元龟·内臣部·总序》：“宪宗元和中，始制枢密二人，刘光琦、梁守谦皆为之。”从此宦官掌枢密便固定下来，枢密使制度最终确立，直至唐末。

枢密使的职掌，《文献通考·职官十二·枢密院》云：“承受表奏，于内中进呈，若人主有所处分，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。”因而枢密使的基本职掌是内呈外宣、出纳王言，是联系皇帝与中书省的纽带。随着宦官势力的膨胀，枢密使逐渐成为内廷中枢决策的主要成员之一，其权势不断扩张，蚕食相权。

## 2. 宦官神策军中尉及其执掌

唐代宦官统帅禁军始自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，继李辅国后，代宗时期的程元振、鱼朝恩相继统领禁军。自鱼朝恩被杀后，代宗取消了宦官典兵之权，将禁军权柄交与南衙。唐德宗时期，政局动荡，经“奉天之难”，唐德宗对宰臣的猜忌进一步加深，于是剥夺了南衙的禁军权柄，任命宦官为神策军中尉，统领中央禁军——神策军。《资治通鉴》卷 263 天复三年正月条：“（德宗）猜忌诸将，以李晟、浑瑊为不可信，悉夺其兵，而以窦文场、霍仙鸣为中尉，使典宿卫，自是太阿之柄，落其掌握矣。”《旧唐书·窦文场霍仙鸣传》载：“贞元十二年（796）六月，特立护军中尉两员、中护军两员，以帅禁军，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，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，右神威军使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，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，自文场等始也”。可见，宦官典军制度正式形成于唐德宗时期，从此，宦官堂而皇之地执掌禁军权柄，直至唐末。

神策军中尉作为皇帝的特使，被赋予了统领禁军的职权，此为神策军中尉的基本职掌。神策军中尉的职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：一为镇守。神策军中尉率神策军镇守京畿，负责京城及皇宫、皇帝的安全保护。如“建中末，盗发京师，窦文场以神策军扈跸山南”。唐敬宗时发生了张韶之乱，张韶率众攻入宫中，左神策中尉马存亮“自负上（敬宗）入军中，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。”二为出征。神策军中尉还常常率军出征，参与平叛。如德宗时，朱滔叛乱，围攻唐将张孝忠，“（左神策军中尉）窦文场率师援孝忠，滔解去，遂全其军。”宪宗元和初年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乱，“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、右神策、河中、河阳、浙西、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、招讨处置等使”率兵出征。元和十五年（820），十月，（吐蕃）侵逼泾州。（穆宗）命右军中尉梁守谦充左右神策、京西、京北行营都监，统神策兵四千人，并发八镇全军往救援”。

神策军中尉以统兵权为后盾，广泛干预朝政，职权不断扩张，参议军国要政，成为唐廷中枢决策中的重要角色。

## 3. 权阉四贵对相权的分割

唐中后期，权阉四贵势力不断膨胀，枢密使是皇帝的喉舌，神策军中尉则是最具实力的角色，二者内外相连，分割相权。首先分割宰相的议政权，进而分割宰相的行政权，成为中央制衡机制中的关键角色，基本上形成了枢密使、神策军中尉、宰相为主的新的中枢决策体系。

枢密使与神策军中尉均具有参决机要的议政权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
其一，神策军中尉与枢密使均参与国家重大决策。枢密使早在宪宗朝，已颇有窃弄朝柄而干相权者。如枢密使刘光琦，每当“宰相议事，有与光琦异者”，他通过中书小吏滑涣达意，“常得所欲”，连宰相“杜佑、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”。元和初，河北王承宗叛，金吾大将军卢从史与王承宗勾结，宰相裴垕与宪宗密谋除之，“（裴）垕因请密其谋，宪宗曰：‘此唯李絳、梁守谦知之。’时絳承旨翰林，守谦掌密命”。可见，枢密使自产生之初，便成为中枢核心成员。对此敬宗朝谏官高允上疏云：“东头势重于南衙，枢密

权倾于宰相。”<sup>⑪</sup>神策军中尉同样参与中枢决策，《旧唐书·澧王恽传》载：“惠昭太子薨，议立储副，（神策军中尉）吐突承璀独排群议，属澧王，欲以威权自树。”此事虽宪宗反对，吐突承璀未得逞，但说明吐突承璀以神策中尉身份参议国家大事。其他如文宗朝的神策军中尉仇士良、僖宗朝的神策军中尉田令孜、昭宗朝的神策军中尉杨复恭等，都先后是中枢决策中的核心人物。

其二，参与宰相延英殿议政。唐中后期，每遇大事，皇帝召宰相在延英殿问对，决策大政方针。唐后期，宦官两中尉与两枢密使均有权列席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63天复元年正月条：“宰臣延英奏事，枢密使侍侧，争论纷然，即出，又称上旨未允，复有改易，挠权乱政。”又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63天复元年十月条：“是时，开延英，（宦官中尉）韩全诲等即侍侧，同议政事”。正如唐懿宗时宰相于憬所言：“内外之臣、事犹一体，宰相、枢密共参国政。”<sup>⑫</sup>

其三，在定策立君这一关键决策中，权阉四贵将宰相挤出圈外。唐自高祖以来，皇位继承不稳定已成传统，既是所立太子仍是“不牢固之继承者，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”<sup>⑬</sup>。玄宗以前，宰相参与定策储君、拥立新君，宦官无权与闻。自玄宗始，宦官开始参与拥立皇帝，如玄宗即位前后的两次政变，宦官高力士、杨思勰皆立殊功；宦官李辅国更是肃、代两朝之定策元老。但直到宪宗，宦官虽参与定策，宰相仍起很大的作用。德宗、宪宗以后，由于内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制的确立，权阉四贵在定策中逐渐占据主动。

《唐语林·补遗》卷7云：“宣宗崩，内官定策立懿宗，入中书商议，命宰臣署状，宰相将有不同者。夏侯孜曰：‘三十年前，外大臣得与禁中事。三十年以来，外大臣固不得知，但是李氏子孙，内大臣立定，外大臣即北面事之。安有是非之说！’遂率同列署状”。由此可见，自唐中期有关定策大计，宰相已不得与闻，如文宗病危时，宰相李珣、杨嗣复等谋奉太子监国，左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、仇士良乃矫诏废黜了皇太子李成美，改立颖王李漉为皇太弟，李漉即位，是为武宗。<sup>⑭</sup>僖宗病危时，群臣以吉王李保年长且贤明，欲立之，神策军中尉杨复恭乃率兵迎立寿王李晔，是为昭宗。<sup>⑮</sup>可见，宰相在定策中已无足轻重。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，‘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’<sup>⑯</sup>，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继位之外，其余穆、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、昭七帝，均为宦官所拥立。

权阉四贵不仅干预宰相议政，而且干预南衙的行政事务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：

其一，分割宰相的施政权。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十二》云：“僖昭时（中尉）杨复恭、（枢密使）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，乃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。”唐时敕书用黄纸，凡有更改的地方，仍以黄纸贴之，谓之帖黄。神策军中尉杨复恭、内枢密使西门季元利用职务之便，用帖黄的办法，擅改制敕，直接发布政令，侵夺宰相的施政权。

其二，分割宰相的选任之权。早在玄宗时期，宠阉高力士便对朝官的选任和任命施加影响，如“宇文融、李林甫、李适之、盖嘉运、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鉉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、安思顺、高仙芝因之（高力士）而取将相高位”<sup>⑰</sup>。唐中后期，宦官枢密使与神策中尉参与宰相、节度及重要朝官的选任已成惯例。如德宗朝神策军中尉霍仙鸣荐举刘沐为宣武节度使，宪宗朝宰相皇甫镈因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的举荐而入相，文宗朝宰相李逢吉、李训，凤翔节度使郑注皆由枢密使王守澄举荐，武宗朝李德裕因枢密使杨钦义之荐而入相，等等。

其三，分割宰相的财权。昭宗朝宰相崔胤兼盐铁使，神策军中尉韩全诲“请割三司隶神策，帝不能却，诏罢（崔）胤领盐铁”<sup>⑱</sup>。神策军中尉兼领三司，掌握盐、铁、转运之权，南衙的财政大权被分割。

唐中后期，因权阉四贵对相权的分割，宰相之权大大削弱，因而一百余年，没有出现如李林甫、杨国忠那样的权相。但宰相并没有退出中枢决策机构，如宪宗朝宰相李吉甫、李绛、裴度，文宗朝宰相牛僧孺、李训，武宗朝宰相李德裕，宣宗朝宰相崔慎等，在中枢决策中仍起重要作用。在宰相为首的南衙与权阉四贵为首的北司两种政治势力之间，皇帝力求达到均势，以便驾驭。当前者势大时，扶植后者，如德宗、宪宗、穆宗时期，皇帝扶植北司势力，确立了权阉四贵的政治地位，以制约宰相。而随着北司权势的膨胀，文、武、宣三朝，皇帝则倾向南衙，以宰相牵制宦官。由此形成了北司与南衙相制约的制衡机制。

## 二、宦官监军使对藩镇的制约

宦官监军使对藩镇的制约是整个“二元”制衡机制中的第二环节，是唐中后期中央对地方控

制的必要手段。

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力量急剧膨胀，所谓“梁、徐、陈、汝、白马津、盟津、襄邓、安、黄、寿春，皆戍厚兵”<sup>①</sup>。“方镇相望于内地，大者连州十余，小者犹兼三四”<sup>②</sup>。河朔节度使“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，官爵、甲兵、租赋、刑杀皆自专之”<sup>③</sup>。中央集权体制受到严重威胁。怎样有效地控制藩镇，维护唐王朝的统治，是安史之乱后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。肃、代两朝，开始在方镇设置常驻监军使“护兵于镇守”<sup>④</sup>，以“监视刑赏、奏察违谬”<sup>⑤</sup>；对河北骄藩实行羁縻，对中原江淮加强控制。于是宦官作为皇帝的特使分监各镇，如邢延恩监淮西、翟文秀监邠宁、王定远监河东、俱文珍监宣武、薛盈珍监义成、刘英倩监朔方、吐突承璀监淮南等<sup>⑥</sup>，藩镇监军使由此产生。

#### 1. 监军使制度的确立

藩镇监军使真正形成制度，应是从德宗贞元十一年（795）置印开始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34贞元十一年五月条：“甲申，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。戊子，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。……癸巳，以李说为河东留后，知府事。说深德王定远，请铸监军印，从之。监军有印自定远始”。《旧唐书·李说传》也持此说。监军正式颁印，标志着唐代监军使制度的确立。

德宗时期藩镇监军使制度化，不是偶然的。因为贞元年间是藩镇最为跋扈的时期之一。肃、代时期对藩镇“宽仁与姑息”，使其更加桀骜，如代宗不仅对参加叛乱的“东京及河南、北受伪官者，一切不问”；而且“瓜分河北地付授降将”<sup>⑦</sup>。安史旧部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、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、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、薛嵩为相州节度使等，“郡邑官吏，皆自署置，户版不籍于天府，税赋不入于朝廷，虽曰藩臣，实无臣节”<sup>⑧</sup>。德宗即位后不久这些矛盾日益激化，建中二年（781），成德李宝臣亡，其子李惟岳奏求旌节不许，便联合魏博、平卢、山南东道起兵叛乱；翌年，范阳节度使朱滔再叛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响应；兴元元年（784），朱泚为泾原乱军所立，自称汉元天皇，李希烈于汴州称帝，国号大楚，一时天下汹汹，至贞元二年（786）才暂平息，但淮西、淄青、河北等镇仍虎视眈眈<sup>⑨</sup>。于是朝廷益弱，方镇益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监军使强化中央与藩镇的联系，监督藩帅、宣慰乱兵的使命则更加重要。于是德宗正式颁授监军使印信，进一步严密其组织，强化其职任，提高其地

位，完善其制度，使它更有效地发挥“监护统帅，镇静邦家”，“布皇恩于阊外，推赤心于腹中”的作用<sup>⑩</sup>。从而形成镇镇有监军，道道有中使，遍及全国的监军网。

藩镇监军使独立于藩镇自成体系，有专门使衙，其名号见于史书称监军府或监军院。其官署建置，两唐书和各典制史均无专门记载。其机构组成佐官属吏零星散记于各史料之中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胡注：“唐中人出监方镇军，品秩高者为监军使，其下为监军”。即言监军使下有佐官若干。《全唐文》卷445王行先《伪李尚书谢恩表》：“臣谋言：监军副使回，伏奉敕书手诏，宣慰臣及将士黎庶等”。所提监军副使，即监军使之副贰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52乾符三年九月条，“仙芝陷阳武，攻郑州，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，破走之”。关于监军判官在《全唐文》表奏中多次出现。

《唐会要》卷65《内侍省》：“天复三年二月敕：诸道监军使、副监、判官并停”。可见副监、判官都是监军使重要属吏。监军使除副监、判官等主要佐官之外，还有众多的杂役小吏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35贞元十六年三月条：监军使“盈珍遣监军小吏程务盈乘驿诬奏仲南罪”。这里提到的“监军小吏”，就是监军府中的杂役。除此之外，在藩镇各州驻军之地，监军使还要派属吏到各地分监各军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42长庆二年二月条：“诸节度使既有监军，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阵”。这样监军在方镇之内自成体系，直属监军使。综上所述，监军使建制为：监军使为之长，副使协助处理日常事务，判官则分监各地，小吏则为临时差遣来往于中央和藩镇之间，上传下达，形成组织完备的监军体系。

#### 2. 监军使对藩帅的节制

监军使作为皇帝在藩镇的特别代表，其使命是“将我腹心之命，达于爪牙之士”<sup>⑪</sup>。“俯达人情，仰喻天意”<sup>⑫</sup>，即代表皇帝监督藩镇，主要表现为：

第一，“奏察违谬”。这是监军使最基本的一项职能，即监督藩帅是否有违、逆、离、叛等行为。如上元元年（760），淮西刺史刘展“刚强自用”，监军使邢延恩入奏：“展倔强不受命，姓名应谣讖，请除之”<sup>⑬</sup>；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，其子李迺谋乱，监军使俱文珍与都虞候邓惟恭联合，“执迺，送京师”<sup>⑭</sup>。陈许节度使上官说死，“子婿田称迫胁说子，欲邀袭位，惧监军不顺其事，将结谋伏兵以图之”，



监军使范日用与牙门将王沛联合，“尽擒其党于伏匿之所”<sup>③</sup>。长庆二年（822）七月，汴军乱，逐节帅李愿，牙将李齐擅为留后，朝廷发兵进攻，久不克。八月“汴州监军使姚文寿与兵马使李质同谋，斩李齐及其党薛志忠、秦邻等”<sup>④</sup>，李齐之乱遂平。

第二，“监视刑赏”。“连帅有奇勋殊绩，忠国利人之大节，皆得以上闻”<sup>⑤</sup>。如李德裕在方镇有政绩，监军使田全操等“继以事闻，恩诏嘉许”<sup>⑥</sup>。此外监军使对藩帅有规劝弹劾之任，如大中九年（855），浙东李讷刚愎凶暴，引起军乱，监军使王宗景因失弹劾之责，“杖四十，配恭陵。仍诏：‘自今戎臣失律，并坐监军’”<sup>⑦</sup>。

第三，慰抚军士。唐朝后期，乱军逐帅现象时有发生，监军以其特殊身份代表中央安抚军士，平息兵乱。会昌五年（845），昭义军乱，节度使卢钧逃，“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”<sup>⑧</sup>；乾符二年（875）四月，西川“突将作乱，大叫突入府庭”，“监军使人招谕，许以复职名禀给，久之，乃肯还营”<sup>⑨</sup>；广明元年（880），“河东节度使康传圭，专事威刑，多复仇怨，军变，杀传圭，监军周从寓自出慰谕，乃定”<sup>⑩</sup>。

监军使在藩镇中的职权范围，除与军事有关外，还参与其他事务，有的甚至怙权干政。如“严绶在太原，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，绶但拱手而已”<sup>⑪</sup>。同时，藩镇监军使往往与中央宦官势力内外相连，成为宦官势力在地方的延伸。主要表现为：其一，大权阉往往出则监军使，入则中尉、枢密，使宦官势力内外相连。如宪宗朝权阉吐突承璀入为左神策军中尉，出为淮南监军使。穆、敬、文三朝大权阉王守澄出为徐州监军，入为枢密使、右神策军中尉。敬宗朝马存亮入为左神策军中尉，出为淮南监军使。文宗朝大权阉仇士良出为凤翔监军使，入为左神策军中尉；西川监军王戡言入知枢密，枢密使杨承和出监西川。武宗朝杨钦义出为淮南监军，入为枢密使。懿宗朝杨玄翼出为凤翔监军，入为枢密使。僖宗朝权阉田令孜由左神策军中尉出监西川等等。其二，监军使与朝廷“四贵”遥相呼应。如甘露之变，左军中尉仇士良杀李训等，并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，令杀死郑注及其羽翼。张仲清以召郑注议事为名，屏去其随从亲兵，杀郑注及节度副使钱可复、节度判官卢简能、观察判官萧杰、掌书记卢弘茂等，郑注幕僚也全部遇

难。张仲清派军将郑注首级入献京师，梟于兴安门。

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，宦官监军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，并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。它构成了中央与藩镇联系的桥梁，又是控制方镇的工具。从而维系了唐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。

总之，唐中后期，宦官作为维护皇权的强大政治势力内抑南衙宰臣、外监藩镇节帅，成为维系唐朝统治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。由此形成宦官中尉、枢密使与外朝宰相、监军使与藩帅的“二元”体制，君权只有在几种力量的制衡中才能稳固。唐末，由于黄巢大起义的冲击以及南衙北司矛盾的加剧，藩镇势力异军突起，“二元”制衡机制严重倾斜，昭宗天复三年（903）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勒兵入京，大杀宦官八百余人，根除宦官势力，不久，朱全忠杀宰相崔胤，弑昭宗，“二元”体制不复存在，唐王朝也随之灭亡。

注释：

①⑥⑧⑨⑩ 欧阳修：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1323、1323、4925、5872、263、5886、2147、5834页。

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6978、7854、7731、7798、8162、1814、7215、7563、7045、7631、8014、8031、8215、8453页。

①②③④⑤ 刘昫：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011、4712、3819、4757、4187、3081、489、4102页。

①②③ 王溥：《唐会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358、2361页。

①③ 陈寅恪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60页。

①⑨ 杜牧：《樊川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58页。

②④⑥ 王钦若等：《册府元龟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8124-8126页。

②③⑤ 董诰等：《全唐文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285、7286页。

②⑨ 元稹：《元氏长庆集》，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，第215页。

③⑩ 韩愈：《韩昌黎集》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，第189页。

（责任编辑 张卫东）